

张岂之 叶国华 主编  
中国传统  
文化经典  
语录

和而不同

韩星  
高荣楣 编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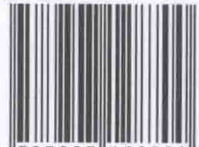
西安出版社

##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以主题为立意，以中华人文经典史籍为素材，以普世价值为编选标准，以语录、今译、时析为呈现方式，以图文相结合为特色，以大众读者为对象，旨在阐释最具民族性、时代性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

ISBN 978-7-80712-870-0



9 787807 128700 >

定价：18.00元

张岂之 叶国华 主编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

# 和而不同

韩星 高荣楣 编撰

 西安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而不同 / 韩星, 高荣楣编撰. —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2.2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

ISBN 978-7-80712-870-0

I. ①和… II. ①韩… ②高 III. ①哲学思想 — 中国 — 通俗读物 IV. ①B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5108 号

---

###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 和而不同

---

主 编: 张岂之 叶国华

编 撰: 韩 星 高荣楣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 (029)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网 址: [www.xacbs.com](http://www.xacbs.com)

印 刷: 陕西宏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60mm×1000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85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2-870-0/K·37

定 价: 18.00 元

---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 序

张岂之

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系列丛书与读者朋友见面之际，我想简要说明一下有关情况，作为这套丛书的总序。

## 一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随着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文化日益受到国内外和各界人士的关注。中华文化典藏浩如烟海，要进入这座精神宝库，殊非易事。近年来，我国学人们在研究：如何在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准确地向公众普及中华文化？我国不少专家学者写出了阐释中华文化的著作，其中有学术提高性的，也有通俗普及性的。学术性与普及性如何结合得更好，大家正在探索中。这也引起身在海外学者的重视，余英时先生在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2008年春季号“学人寄语”中说：“中国人文研究的‘提高’和‘普及’是一项不可分割的迫切任务，承担它的不仅是‘普及’作者，人文专家同样义不容辞。”

我对此是深有体会的。十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为学生作讲演，讲中华文化悠久丰富的人文精神，当时尝试在文化研究与普及上做些工作。我将中华人文精神扼要地概括为若干方面，以可靠的资料做基础，力求加以切实的解剖和分析，为年轻学子和读者朋友提供关于中华人文精神的知识，想给人们在塑造高尚的精神世界、培育健康的审美能力时以助益。我主编的季刊《华夏文化》也是进行文化研究与普及相结

合的园地,在近二十年的办刊实践中一直保持这个特色。当然,和其他学人一样,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在高深的学术研究与通俗的文化普及之间进行沟通的艰辛。多年来国内人文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陆续出版了一些受专业学者和文化爱好者欢迎的著作。

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似乎只是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实际上,远没有这样简单。文化普及工作,除要求文字表达简明准确、生动活泼之外,在内容上也要有深入的研究,学者可以通过简明的文字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传达出来,让更多的读者受益。在这个方面,要重视“深入浅出”:只有“深入”,有了研究心得,内容才有价值;只有“浅出”,文字简洁、生动,才能吸引广大读者。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关于建设我国现实主体文化的问题,其中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应当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经过新的介绍和阐释,以便在现代公民中普及现实主体价值观。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当然,这一建设需要从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去做。可见,文化普及性的工作在中华文化的弘扬中意义重大。只有当人们理解到自己的工作是和建设现实主体文化相联系的时候,才会感到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 二

2007年上半年,负责西安市理论宣传工作的王军先生向西安出版社提出倡议,希望由我和香港的叶国华先生共同担任主编,选编、出版一套力求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又以普及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当西安出版社负责人向我说明这个计划后,我觉得很好。为什么要提“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这意味着被邀请写稿和审稿的人,需要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素养,进行过有关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这样,他们做普及工作才有根底,在科学性上才有保证。为什么又要强调“以普及为主”?因为这套丛书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文化普及读物,主要面向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群,在关于中华人文经典的阐释上,要使读者们能够看懂,并且能



读出兴趣来，这样才能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让它在现实社会中滋润人们的心田。

这套丛书从确定编写方案到编辑出版，历时一年多。期间，由西安出版社社长张军孝先生召集，先后开了几次会议，研究编写方案、初审情况和提高稿件质量等。关于编写中的主要问题，我都参与了意见，多数稿件在初审和复审后，我都看过，而且写出了再修改的一些建议。在工作过程中，叶国华先生以及香港耀中出版社的同行也通过西安出版社提出了若干建议和意见。

本丛书第一批共12本，包括《天人之际》《道法自然》《生生不息》《居安思危》《以民为本》《仁者爱人》《慈悲为怀》《养生有道》《明德至善》《诚实守信》《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它们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论著的选编，分别考察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认识及其对人类政治伦理生活和社会理想的影响，大体能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性、民族性，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今天的学人加以阐释，体现时代性，成为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思想资料。

《天人之际》，编撰者是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许宁副教授和硕士研究生郭荣芳。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学术文化中对于“天人之际”的艰苦探索，成为探讨个体生命价值及其与自然及社会联结的理论基石。“天人之际”不仅包括“天人合一”的观念，而且包括“天人相分”、“天人交胜”的认识，它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人与自然怎样才能达到和谐的境界。

《道法自然》，编撰者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郑熊博士。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对今天反思和处理环境问题有深刻的思想启迪。它强调一切都要顺应自然、自然而然，反对人强行妄作。“顺应自然”的理论观点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用来处理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系，有助于实现人、社会、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生生不息》，编撰者是西北大学社会科学系付粉鸽博士。生生不息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它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面貌，赞颂了人的生命尊严，展现出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它也是中华文化保持长久活力、

绵延不绝的内在原因。古人认为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天地化生的推动力,这种辩证思维具体表现为“有对”精神、“会通”精神和“中和”精神。

《居安思危》,编撰者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陈战峰博士。《左传·襄公十一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它是中国以儒道两家为主干的“百家之学”的共同认识。它从事物变易转化的高度观察和审视自然与社会的发展,提醒人们关注治乱、兴衰的转换,提高预察事物的认识和能力,树立常备不懈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反映了人们以史为鉴、努力实现长治久安的自觉性。

《以民为本》,编撰者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周淑萍副教授和硕士研究生王夏红。以民为本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识,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等。它在本质上是君主制下的爱民、重民、保民、富民、乐民的理念。以民为本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全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百姓的关怀,在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仁者爱人》,编撰者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星教授和硕士研究生杨永亮。“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宗旨和根本。孔子阐述“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儒家主张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然后推广去爱别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名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表述。

《慈悲为怀》,编撰者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宋玉波博士。“慈悲为怀”是佛教教义,其哲学基础是缘起理论,力求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去看世界万物。它体现出鲜明的人文关怀与深沉的宗教情怀,是对人类常情的一种升华与超越,不断激励人向善,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建设美好和谐的人间社会具有激励意义。

《养生有道》,编撰者是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张应超研究员。中国医药学与养生学是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尊重生命成为中国医药学和养生学的核心理念。古代思想家大多认为人的寿命长短与个人的修养功夫有关,重视德行,知足常乐,淡泊宁静,养气保神,注重饮食起居,导引按摩,从而使养生成为身体与精神相协调的具体行动。



《明德至善》，编撰者是西安文理学院王美凤教授。《礼记》中的《大学》篇强调“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明德”是一个长期的学习、修养的过程。古人不断追求和践行君子之道，通过修身养性使精神达到至高的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人皆可以成为圣贤，不靠天赋，也不靠家庭门第，而是要凭借自身的精进努力，充分彰显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意义。

《诚实守信》，编撰者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李江辉博士。“诚”“信”是古代思想家对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进行总结和理论概括的成果之一。《礼记》中的《中庸》篇称“诚”为天道，称向“诚”学习为人道，可见，人道就是使“诚”得到实现，并成为人的行为准则。诚信强调名实相符、言行如一，包括诚实和守信两个方面，它们也是人道德品质的一种表征。

《天下大同》，编撰者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星教授。《礼记》中的《礼运》篇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大同”社会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准绳，它不同于“天下为家”的社会。虽然“大同”理想主要源于儒家，但是它也同时吸收了墨家和道家的某些思想，是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文化精神的结晶。

《和而不同》，编撰者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星教授。“和而不同”的“和”是指多样性的统一，是建立在异质性基础上的。而“同”则是同质性的一致，是没有生命力的同一。“和而不同”思想贯穿于中华文化发展的始终，又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在“和而不同”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不断创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今天，“和而不同”思想仍是我们建设美好社会的指导性思想。

丛书各册均围绕一个主题，根据编撰者对相关历史文化及思想家语录的梳理分析设置章目。体例由导读、原文、今译、时析、参考文献组成，个别字句适当加以简要注释。“导读”介绍各分册的主要内容和编撰者的研究心得，它有助于读者了解各专题的思想要点和编撰情况。“原文”所选条目范围比较广泛，涉及经史诸子典籍，力求言简意赅，具有理论性。不少条目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也具有普世价值，对当今现实世界具有借鉴意义。“今译”力求准确流畅，通达雅洁。“时析”是本丛书的特色之一，侧重阐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三

参与这套丛书编撰工作的学者，最年长的是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张应超研究员，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养生学的研究；其余都是中青年学者，大多数具有历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经历过良好的科学研究训练，撰写发表过学术论文，目前在高校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哲学等专业的科研教学工作，具有承担相关主题编撰任务的学术素养和能力。

各册初稿完成后，都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个阶段。初审工作主要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谢阳举教授负责。在初审意见基础上修改后的二稿，则进入复审环节，主要由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刘学智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方光华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谢阳举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星教授分别承担。在复审意见指导下对二稿进行修改斟酌，形成三稿，进入终审环节。多数稿件经过我审阅，并对所阅分册分别提出具体意见，少数分册由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陈学超教授审定。通过终审的稿件，再加以润色调整，移交西安出版社。出版社对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和策划，每个分册安排有专门责任编辑负责编辑和技术处理工作。此外，这套丛书先行在内地出版中文本，再由香港的叶国华先生负责主持，译成英文，形成中英文对照本，以便在海外发行。

应该指出的是，编撰一套较好的、分量不大、可读性较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并非易事，这项工作还需要不断积累经验、提高水平，才能做得更好。

我诚恳地希望这套丛书能够贴近大众生活，为读者们学习中华文化提供一些便利条件，至于其中的错误和不足，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2008年6月

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 序

叶国华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经编撰团队同仁辛勤不懈的努力，终于出版面世。2007年春天王军先生提出这个倡议，得到张岂之先生和我的赞同。随后，我们在丛书编选方式上很快达成了一致，包括按主题选材，采取今译时析的体例，等等。负责编撰审校的各位学者付出了大量心血，岂之先生住院期间和康复出院在外地出差过程中，仍经常关心过问编撰进度和质量，通过多种方式提出指导性的意见。丛书在队伍组织上的一个特色，使得香港的耀中教育机构的学者也参与了工作，希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拉扩一些现代普世价值的视角，并在将来的海外出版中，担当一个中西沟通的桥梁作用。

参与这项重要工作，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和思考的机会，对我这个香港人更有着特别一些的意义。我生在二战时的殖民地，知事时适逢抗战胜利，中国位列战胜国五强，自幼便感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环境。此后的政治环境变化迅速，我们这一辈人在成长中又经历了国家政治经济形势起伏变迁的深刻影响；但因身在境外，有机会相对稳定地学习与生活，当然也有身处殖民地的抗争与曲折，但总的来说可以有一个自由思索的环境，故在对祖国保持深爱的同时，也对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反复出现的连串问题常进行思考，如：为何中国能强大两千年，而近代以来又衰落而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近三十年，中国终于走上了和谐社会、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此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与效果如何？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全面崛起后，中国人将在世界上展示什么形象？中国在上世界上人口占如此大的比例，我们对这个星球及她所承载的人类万物能有

同比例的爱护与贡献吗？九百多年前张载就提出民胞物与，届时人们还有此理解与抱负吗？传统文化经典中蕴藏着大智能，从中撷取那些闪烁着永恒之光的金石良言，温故而知新，对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是会有不少启迪的。

我们在承传与创新传统文化中，也要有世界的视野与责任。中国的“崛起”，客观上就动摇了世界的原有秩序，引起原秩序得益者的种种回避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调整自己，循序渐进，加强沟通，学习别人，介绍自己，还要对原有秩序有建设性的调适与尊重。二百年来，我们看世界特别是西方，与中国是对立的关系，到了新时代，这种对立应成为包容，即“世界的中国”，“中国的世界”。对于中华文化，中国人要有爱、温情与敬意，也要在比较与认知的基础上，有建设性、批判性的新解，找出与全球价值接轨的内容，让全人类都有所了解、有所融会，才能参与回应21世纪全球人类的共同问题。中国人对世界其他文明体系、文化与价值观亦应持了解、欣赏、学习、借鉴的态度。今天，世界各种文明已走向休戚与共的整体，中国也已是世界的一部分，作为达成世界良治的利益相关者，中华民族已成为世界人民与地球万物的成比例的造福者。我们出版《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语录》，也希望在中华文化与当代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

孔庙大成殿有匾额“中和位育”，这是我近来常提到的一个哲理，它对个人、机构、社会、国家都极有指导价值。好的文化与制度，就在于为人在世界找到适应的位置与关系，同世界和谐相处，才能健康地生存与发展。经过百年屈辱的中国，在取得诸如经济腾飞、成功举办奥运等成就后，要的也是“中和位育”，不强出头，泰然处于大千世界而达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之境。这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点新解吧！

中华经典博大精深，无论我们多么认真细致，倾力以赴，编撰当中的疏漏也在所难免；更因以今人认知加以选择诠释，则难求全，故只算是抛砖引玉，开一个头，以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发扬作一个新的尝试。

2008年6月于香港清水湾

# 导读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贯彻其中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和而不同的和合会通精神。古代中国的先哲们通过对天地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同现象进行大量的观察和探索，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认为“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建立在事物相互区别的基础上，而“同”则是单纯的一致，是没有生命力的单一。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华文化博采众长，不仅融合了国内各个民族的文化，而且吸收、消化了外来文化，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的思想，朴素地说明“和”是一种承认有矛盾、有差异的同一性，而“同”则是否认矛盾、不承认差异的同一性。春秋战国时期“道术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百家争鸣”，各执一端，他们的思想观点都是“和而不同”文化观念的具体表现，百家互相诘辩、互相批评，又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繁荣的鼎盛时期。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是正派的人以“和”为准则，但不肯盲从附和，而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正派的人处处盲从附和，而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把“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同时也作为处理不同文化冲突的原则，形成了他的文化观，孔子的弟子有子也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又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本着孔子的思路，寻求和而否定同，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易传》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观念，讲“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一），认为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中庸》中提出：“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是讲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为人要和顺，善于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但又不能无原则地随波逐流。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认为“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庄子认为“和”是天德、天道的本性，是万物生成的缘由，追求一种融洽、协调、平缓的状态和境界。

《管子》将和合并举,指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管子·幼官》)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所以“不能相和合”(《墨子·尚同上》)。兵家以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这种不战而胜实际上是“和战”。《吕氏春秋》在思想文化上力求融合百家之学,“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故称杂家。但它并不是把各家思想拼凑成的大杂烩,而是杂而不乱,相互协调以别于其他思想派别而自成体系的。

秦汉以后,“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观念。汉代大儒董仲舒就崇尚“和”,他说:“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以“和”作为天地间最普遍的原则,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董仲舒所主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道、法、阴阳五行等各家思想而开创的新儒学。《淮南子》力图综合先秦百家之说,以道家为基调和主线,归纳别的学派的思想观点,也是“和而不同”文化观的产物。道教《太平经》重视阴、阳、和三者和合,而佛教则讲因缘和合,“诸法因缘和合生,故无有法;有法无故,名有法空”(《大智度论》卷三一)。因缘和合论是佛教的重要理论,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文化中所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程也是和而不同的典型例子。魏晋南北朝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还是独立的,相互间互有影响。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又以“和而不同”文化观念为指导,一方面批判了佛、道二教忽视社会治理,有悖于儒家伦理的思想,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吸取佛、道较为精致的思辨哲学之长,建立起完整的理学或称新儒学的思想体系。

到了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又以开放的姿态吸纳西方文化,“现代新儒学”也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果。他们站在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心性之学的立场上,以接续传统命脉为己任,“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形成了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在20世纪新发展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他们志在“返本开新”,这里的“本”指的是传统儒学,“新”是具有西方“民主”、“科学”的社会结构。

在中国思想史上,与“和而不同”接近的相关思想观念非常丰富,下面加以概括梳理。

“保合太和”是《易传》提出的十分重要的一个观念,认为“保合太和,乃利

贞”(《周易集解》卷一)，“太和”是天地人和谐一体的极致状态或者说理想境界，只有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北宋张载把宇宙本源的、最高的和谐状态称为“太和”，并把“太和”提高到“道”的高度，提出“太和所谓道”的命题，认为“太和”就是宇宙间最高的“道”。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指出“和”有层次性，“太和”是“和之至也”，是和谐的极致。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是以太和作为自己的思想追求的。我们也可以从“太和殿”的无上地位体会到“太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至高价值。这一至高价值，是以服从于传统社会的伦理规则与社会秩序为前提的。

“天人谐和”。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谐和思想有两派：一派从和谐的视角看天人关系，认为天人本来就是和谐的，如道家在道为终极本体的基础上提出天人谐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强调天地人都要效法道的自然无为、和谐共处的本性。庄子进一步指出：“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者和也。”(《庄子·天道》)“天人谐和”的最高最完善的体现就是《易经·乾卦·文言》所说的大人(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还有另外一派认为有天人相分才有天人相和，如《荀子·天论》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明于天人之分，则谓至人矣”，强调天与人的区别；与此同时，他还要人们从天与人的统一，即从“道”的观点看问题。后来东汉的王充、唐代的刘禹锡都继承和发挥了荀子的思想，强调天与人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中和之道”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更是一个人生和社会实践问题。道家强调阴阳中和之气对于天地万物形成演化以及政治活动的意义。儒家《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赋予“中和”这个哲学命题以最普遍的本体论意义。宋明理学家认为中和为天理的核心，人先天的本性是中和无偏的，而后天的气质之性则各有所偏，圣人设立教化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变化气质，回归天理之中，以达太和之境。“中和之道”应用在人际交往中就是要“心平气和”，讲“和气”。道家所讲的和气主要是指从外界采入的天地自然之真气，指天地阴阳的和合之气。儒家的和气主要是指人和悦、亲切、温和的神情、气色、脸色，非常强调人在处理各种社会伦理关系当中心平气和的修养，认为这对人际关系的和谐非常重要。北宋张载提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主张对待矛盾冲突中要以“中和

之道”化解,这对于处理各种社会政治关系、乃至国家民族的冲突具有重要意义。

“兼和”。大概是张岱年先生最早提出了“兼和”的说法,他认为“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概念,也是包含着差异(“众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多端”)的统一,可以说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哲学中“和”这个概念的辩证涵义<sup>①</sup>。张岂之先生认为“兼和”的思想,直接来源于《墨子》。《墨子·兼爱》上、中、下三篇屡屡提到“兼相爱”、“兼以易别”的问题,“兼”不仅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世界观。“兼”与“和”是两个不能分割的方面。只重视“兼”,有可能会導致大杂烩;只注视“和”,也有可能忽视事物多样性的统一<sup>②</sup>。

“乐和”。在传统礼乐文化当中“乐”的基本功能是“和”,因此关于“乐和”的思想非常丰富。礼乐中的“乐”不单单是我们今天的音乐,而是包括了诵诗、歌舞等一系列艺术活动形式,其最高的艺术追求是和谐,其最基本的社会功能也是和谐。儒家特别强调“乐和”对于伦理关系的调和,如对于君臣的“和敬”,父子兄弟的“和亲”,乡里长少的“和顺”(《荀子·乐论》)。“乐和”是通过音乐的声音作用于人的情感,来对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进行调节,使之符合中道,符合礼仪。到了魏晋,玄学家则认为乐是“天地之体,万物之性”的表现,因而天地万物的本质同时也就是乐之本质。

“心和”。中国思想中一系列范畴:情、性、志、意、思、感、想、悟等等,都由“心”衍生,与“心”密切相关。儒家认为人最重要的是以心为主宰,强调“本心”“正心”“养心”“求放心”“操存此心”“养心之术”等,以使心常在腔子里,并成为一身之主,使人与动物相同的五官百体之欲都听命于心,这也就是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的基本含义。“心和”是心性修养的最高境界。道家的“心和”是指心神的虚静清明,即要去掉人的各种情绪和意念,进入自然无为、与道合一的境界。宋明理学家认为心具万理,心统性情,肯定了心和对于人生修养的主体作用。

“家和人和”。儒家思想的根底是家,所以儒家对家和的重视程度是无与伦比的。家庭里的主要关系就是父子、兄弟、夫妻。父子亲厚,兄弟和睦,夫妻和谐,这是家庭的健康正常状态,反之就会导致家庭不和。家庭不和是社

①方克立:《关于和谐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光明日报》2007年8月13日。

②张岂之:《兼和·守正·日新》,《华夏文化》2007年第4期。



会不和的根本原因，古代圣王为了治国平天下，首先都是从家和做起，把治家作为治国的第一步，或者说治家就是治国的一部分。所以《增广贤文》说“一家之计在于和”，我们俗语也说“家和万事兴”，都是对家和的重视。在家和的基础上推而广之就是“人和”。《论语·学而》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礼乐文化虽然讲等级差别，但其理想目标是以和为贵。后来，人们不断地把“和为贵”泛化，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论语·颜渊》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的忠恕之道，是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黄金律”，具有普世价值。《孟子·离娄下》提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是从爱敬的相互影响来谈人际关系和谐的。

“政和”。“政和”是古代思想家对政治的和谐稳定安定的追求，《尚书·周官》提出“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孔子还注意到了经济和社会分配对政治的影响，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子路》）的思想，以实现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政治理想。《管子》的思想吸收道家、儒家、墨家等各家思想，在“政和”方面的考虑比较全面细致，值得我们重视。

“协和万邦”。“协和万邦”很早就成为中华民族处理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准则，儒家把它推演到平天下这一层面，后来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以贯之的博大精神和包容传统。《左传·隐公六年》提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孔子不主张对外侵略和征服，而提出“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周礼·天官冢宰》通过制度化的设置来使得各个诸侯国和谐相处。儒家还提出超越一国一族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下观”来构筑和谐世界。老子在诸侯兼并战争的春秋提出雌柔居下的思路来处理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和而不同”的辩证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引导出兼综百家、独立思考与求实创新的优良传统，需要我们加以继承和发扬。古代许多大思想家、学问家之所以在思想学术上有所成就，在文化史上有所贡献，就在于他们能够打破门户之见，凡是有用的好的东西都能够吸收利用，综合各家之长，努力进行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在于不墨守成规，兼综百家则需要独立思考，这些都是“和而不同”的基本要求。所谓独立思考，就是敢于提出问题，又善于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创新。独立思考自然会产生疑问，产生疑问经过独立思考得到解决，认识就会得到提高。在思想学术的传承发展过程中，独立